



“九五”国家重点图书

走向海洋贸易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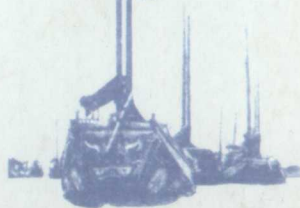
——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商人行为

陈东有 /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上

海洋
与
中国

丛书
杨国桢
主编



走向海洋贸易带

——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商人行为

(上)

陈东有\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九五”国家重点图书

杨国桢 主编

海 洋
与
中 国
——
丛 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向海洋贸易带：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商
人行为/陈东有著. -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 11
(2007. 4 重印)

(海洋与中国丛书/杨国桢主编)

ISBN 978 - 7 - 81033 - 865 - 3

I. 走... II. 陈... III. 沿海 - 地区 - 对外贸易 - 经济史 -
中国 IV. F7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3799 号

海洋
与
中国

书 名 走向海洋贸易带：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商人行为
编 著 陈东有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政编码 330046
电 话 (0791) 8529392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6.25
字 数 230 千字
印 数 1 - 5000 册
定 价 84.00 元 (上中下)
书 号 ISBN 978 - 7 - 81033 - 865 - 3

(江西高校版图书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中国是一个兼具陆海、生态环境多样性的大国。海洋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环境。现今中国的版图内，有 1.8 万余公里的海岸线，1.4 万余公里的岛岸线，沿海岛屿 6500 多个，5 大海域的海洋国土达 300 余万平方公里，相当于陆地国土的 1/3。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地向海洋进军，发展了自己的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模式，积淀了丰厚的文化，体现了中华文明海洋性的一面。

中华民族有光荣的海洋发展传统，也经历过从海洋退却的严重挫折。向海洋开放，曾使中国传统的海洋产业、海洋贸易和海洋科技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厉行海禁，压抑向海洋发展的传统，曾使中国丧失海上竞争的优势，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走向海洋与忽视海洋的选择，关乎国民经济和社会文明的全局，这是我们的先辈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



换取的认识。

21 世纪将迎来海洋大发展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海洋发展战略，力图在新世纪抢占海上竞争的制高点。中华民族面临复兴海洋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贯彻、落实海洋发展的基本国策，重振海洋大国的雄风，不仅是海洋界、经济界和政府部门的事情，同时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积极配合。

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需要发达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国民海洋意识的普遍薄弱，植基于历史上重陆轻海的社会价值导向和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发达。当代中国的海洋性研究虽在一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取得突出的进展，但尚未出现海洋政治学、海洋经济学、海洋社会学、海洋法学、海洋管理学、海洋旅游学、海洋军事学、海洋史学、海洋考古学、海洋文学、海洋民族学、海洋文化学、海洋民俗学、海洋宗教学等的全面振兴，更没有形成多元综合的学术体系。沿海地区、海洋国土和中国人从事海洋活动的外海区域，蕴藏着大量中国海洋社会人文成果和信息，有待进一步发掘和阐扬。

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是一项跨世

纪、高难度的理论工程，需要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海洋与中国》丛书有志为此做基础性的学术累积。首期出版的各册，都以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社会人文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先人向海洋发展的努力、成败和荣辱，在吸收消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挖掘民间和海上的各种中国海洋社会人文资料和信息，探索运用多学科整合的研究架构，重新审视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的价值，力争有所突破，为下世纪最终达到融合创新，重塑中国海洋文明奉献一份绵力。希望这一尝试能性能发凡起例，得到各方面的理解、帮助和支持，唤起更多人文社会科学人士的关注和投入。同时也希望它的出版，有助于全社会更新观念，提高对中国海洋发展重要性的认识，造成关心、支持、投入海洋发展的人文氛围，迎接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科技和海洋社会人文大发展的 21 世纪！

楊國棟

1998 年元旦

走向海洋贸易带

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商人行

致读者

研究历史，是为了尽可能地“还原”历史，“复忆”历史，并且找出错误，总结教训。这是历史研究的主要重任，也是本书写作的第一出发点。

当然，研究历史不仅是因为我们有了历史，而且还是因为我们有今天，有未来。因此研究历史的动机之一还在于通过对历史的“还原”“复忆”，来为今天的我们和未来的后人提供更好地生活和更快地发展的借鉴，提供更有益更深刻的思想素材。比如我们曾痛心疾首地感慨我们的前人失去了许多富民强国的机遇，那么那些机遇是如何失去的？我们的前人为什么会失去本该属于我们的机遇？错误何在？教训何在？我们还深思过这样的问题：我们曾有过郑和七下西洋的海上力量，为什么在我们的前人中间没有出现过哥伦布？我们有数千年的商业历史，有相当成熟的商业文化，为什么我们的商人总是抬不起头来理直气壮地为谋利而经营？中华文



明至少已有三五千年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社会维系和变迁的传统制度、习俗究竟是什么？而在近三五百年的世界巨变中，当那些后起的国家与民族凭依适时的制度和先进的技术先后跨进近代资本主义之时，为什么中国仍然徘徊在传统的道路上，不能跨进资本主义社会？

探讨这类问题，有许多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不同的角度和视野。多样性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历史的丰富内涵。而从海洋看中国，可以得出与传统的从陆地看中国不同的结论与思考。

—

商人，当社会生产发展到由分工而产生交换时，就已经诞生了，后来交换的发展，只是促进他的行为成熟。市场，是以交换行为为主要活动的特别空间，我们习惯称商品交换的场所是市场，然而，这只是市场的物质表现；市场的实质内涵是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是通过商品交换体现出来的生产者、流通者、消费者之间的供需互利互动关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成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

互相成为市场。”^①

中国的商人与市场的萌生比较早，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进入16世纪，世界由于地理大发现，海洋经济活动空前频繁，进入到全球性以互利商贸和殖民掠夺并存、各种商人和市场都企图发展为特征的近代经济形成时期；而中国的国内进入了一个商品和市场都较为发展的时期，以海上贸易为主要内容的海洋社会经济也出现了新的发展：中国商人，特别是东南地区（包括今日的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江西、安徽七省）的商人参与以海洋联系为载体的、形成中外互动作用的近代世界市场的活动，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新的进步。直到19世纪中叶，历史才翻开了另一页。

对于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中国东南商人参与近代世界市场活动的这一段历史，多年来，已有不少专家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学术报告和研究成果。恕我孤陋寡闻，前辈学者的学术关怀，大体集中在商人与商业资本、市场、海外贸易和对外关系等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资本论》，第3卷，第7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面。^①据现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的中国海外贸易有如下主要内容:

其一,中国对外海上贸易是发展的,并以合法的(朝贡贸易)和不合法的(民间走私贸易)两种形式进行着。“新航路发现后,西方国家商船东来,中国海外贸易跟着展开新的局面”,“由于海洋航运效率提高,中国海外贸易规模越来越大,为过去中外贸易所望尘莫及”(全汉昇)。对于贸易的性质,有学者认为是“进步的现象”,但又存在不少弱点(傅衣凌);有学者认为是“从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出来的,是为当时的封建制度服务的”(张维华)。在发展的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原本可以继续发展的中国帆船海外贸易由于“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榨才绞杀了中国远航帆船发展的前途”(田汝康)。

① 我必须感谢许多学术前辈、同仁及他们的丰硕成果给予我的学术启示。当本书还是博士论文时,我在“学术回顾”一章中讲述了他们的成就,在这里我再一次表示我对他们的无限敬意和衷心感谢:

梁嘉彬先生:《广东十三行考》,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傅衣凌先生:《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吴承明先生:《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张维华先生：《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田汝康先生：《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航运和商业上的地位》，载《历史研究》，1956（8）；《再论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业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57（12）。

张铠先生：《晚明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北京：《中国史研究》，1988（3）。

黄启臣先生：《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北京：《历史研究》，1986（4）；《清代前期的广州对外贸易》，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2。

邓开颂先生：《清代前期政府对广州海外贸易的若干特殊政策及其影响》，载陈柏坚主编《广州外贸两千年》，广州：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

蒋祖缘先生：《清代佛山的商业和商人》，载《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林仁川先生：《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陈希育先生：《中国帆船与海上贸易》，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

黄福才先生：《台湾商业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全汉昇先生：《明季中国与菲律宾间的贸易》，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1）；《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路》，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7（2）；《略论十七八世纪的中荷贸易》，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0（1）；《明清间中国丝绸的输出贸易及其影响》，见《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国史释论》，上册；《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中国海外贸易》，见张彬村、刘石吉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五辑，第1～16页；“The Chinese Silk Trade with Spanish America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Mid-Ch'ing Period.”载 Laurence G. Thompson, ed., *Studia Asiatica: Essays in Felicitation of the Sev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Professor Ch'en Shou-yi*, CMRASC Occasional Series No. 29.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Inc. 1976.



王业键先生：《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Monetary System, 1644 ~ 1850*, in Hou Chi - ming and Yu Tzong - shian, ed.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Taipei: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1979, p. 445；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1。

林满红先生：《明清的朝代危机与世界经济萧条——19世纪的经验》，载《新史学》，卷1，期4，1990（12）。《银与鸦片的流通及银贵钱贱现象的区域分布（1808 ~ 1845）——世界经济对近代中国空间方面之一影响》，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2期上，1993（6）。

[美] 马士（H. B. Morse）先生：《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以下简称《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The Period of Conflict, 1834 ~ 1860*），第1卷，张汇文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57。

[英] 格林堡（M. Greenberg）先生《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 ~ 1842*），康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日] 大庭脩先生：《关于平户松浦史料博物馆收藏的〈唐船之图〉》，傅念祖节译自《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5号，载中外关系史学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大庭脩编辑的史料如《唐船进港回棹录、岛原本唐人风说书、割符留帐》，由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昭和四十九年（1974）发行。

[日] 滨下武志先生：《资本主义殖民地体制的形成与亚洲——19世纪50年代英国银行资本对华渗入的过程》，见《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宋元明清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612 ~ 650页。

[菲] 欧·马·阿利普先生：《华人在马尼拉》，载《中外关系史译丛》第1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泰] 沙拉信·威拉蓬先生：《清代中泰贸易演变》，见《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

其二，由于中外贸易是发展的这一结论得到学者们的基本肯定，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关系引起了许多学者的热烈讨论。“至晚明，中国市场已成为世界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张铨）；有的则认为到鸦片战争前夕出现“中国原有的全国性经济体系在近代初期扩大并与世界经济体系整合的繁复网络”（林满红）；有的还认为，在“中国的世界市场扩大过程”中，英国银行资本通过“AB两种三角贸易”向中国渗透，整个渗透的主要过程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但是这种渗透的发端却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近百年时期（滨下武志）。

其三，对于商人的研究，有的学者注重把商人，特别是海商作为海外贸易的行为主体进行研究（傅衣凌），更多的学者由于注重的是海外贸易或市场的研究，即经济史的研究，人——商人的研究往往是作为物——商品研究的附属，商人行为的研究不多，少量的研究往往是作为支持商品流通状况、数量研究的载体形式被纳入分析过程中的。

这样，在对明清时期海外贸易、世界市场和有关商人的研究中，既取得了功不可没的丰硕成果，又还有很多工作须继续努力。比如：



其一，社会的商贸活动是以趋利为动机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活动同地区间的贸易活动一样，双方都以牟取自己所期望的利润为目的，因此，贸易双方实际上是一种因互利而互动，又因互动而互利的关系。我们不妨设问：中外贸易得以实现，不论其方式如何，是单方面的利益所驱，还是互利互动？中西贸易发生阻隔、冲突，是单方面的利害所致，还是互动过程中利害失去平衡所致？客观地研究中外贸易中的互利互动关系，是探讨明清时期中外海上贸易演变过程的重要内容。

其二，中国是一个多元社会形态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一统国家，再加上时间、空间的限制，中外海上贸易不可能对整个中国产生互动互利的影

响，即使在东南地区也是分层次的。那么在贸易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它的立体层次是怎样构成的呢？在那些与海外贸易发生较为频繁的交易地区，由于商品结构和交通条件、社会条件的不同，又形成了怎样的交易网络，或曰贸易带的呢？具体地考察这种贸易层次和贸易带的实际是分析中国东南地区的市场与世界市场发生种种复杂关系的重要前提。

其三，商人是实现各种贸易的行为主体，一般

的经济史可以不论及经济关系中的行为因素，也可以不论及行为主体，但是研究社会经济史必须把对人的研究作为动机和目的，仅仅依靠并非确切和并非真正统计意义上的数字、贸易形式、商品结构的分析，并不能对人的经济活动作出合理的历史的解释。因此，讨论商人及其贸易行为特征和社会特征应该成为研究中外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

其四，商人行为，是个人行为，也是集体行为；中外贸易又是不同的集体之间的互动行为。悠久的商业历史、厚重的传统习俗、专制的政府同时控制着中国商人在对外贸易中的行为，凝结在中外贸易中的许多问题往往是深层“制度”的结晶。明清时期中外贸易曲折发展的“之所以然”何在？“制度”与个人行为、集体行为的关系何在？

值得指出的是，有关研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学科课题研究条块分割造成的学术发展的局限，使“以往的成果多偏重于个人单项研究的进展，缺少多角度、全方位的整合，或陷于繁琐考证，或专注一个领域”^①，没有把中外海上贸易中的经济活动、

^① 杨国桢：《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2）。



商人、市场纳入到更广的视野和更本质的层面中去考察和讨论。在过去特定的时期和条件下，这种研究不仅造成薄弱环节并留下空白区域，而且有些研究对史实采取一种断章取义为己所需的办法，以打碎历史去替代“复原”历史，以偏狭的政治实用去替代科学的学术研究。今日史学所需要的，是开阔考察史料的视野和敢于面对史料的勇气以及客观分析史料的科学精神。

二

中国是东亚的大陆国家，又是太平洋西岸的海洋国家。“中华民族包涵了海洋民族的成分，海洋发展是沿海地区的传统，海洋人文是中国社会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走向海洋的力量源泉。”^①“事实上，中国比西欧更早怀抱海洋，并以渐进的方式向近代转型。”“从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划等号的旧观念摆脱出来，有助于解开长期以来困扰我们正视自己的海洋社会经济史

① 记者赵洋：《全国政协委员杨国桢倡议：建立中国海洋人文社会学》，载《中国海洋报》，1997年3月4日第2版。

的诸种问题。”^①

什么是海洋经济？什么是海洋社会？

海洋经济，“指人类在海洋中及以海洋资源为对象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海洋经济与人类其他形式的经济一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出现不同的层次，具有不同的内涵。在明清时期，它表现为五种海洋生计：海洋渔业、海水制盐、海洋交通（造船与海运）、海洋贸易和海洋移民。海洋社会，“指向海洋用力的社会组织、行为制度、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的组合，即与海洋经济互动的社会和文化组合”^②。

中国有自己的海洋经济与海洋社会发展历史。中国的海洋社会经济历史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领域去探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海洋有关的问题，不仅可以解决用内陆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观察海洋社会经济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还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不仅可以更全面地去分析中国的问题，而且还会把我们带进到世界

① 《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

② 《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